



2005--2006：中国的社会思潮与理论斗争(杨帆)
(2006-2-25 16:16:58)

作者：杨帆

他们的理论在计划经济下代表经济官僚利益，他们的行为方式一直依靠“官”，脱离市场经济和人民群众。每当政治气候适宜，就跳出来直接争夺话语霸权，他们是不甘心做“非主流”的。

他们固执地认为，在中国，主流应该是马克思主义。某些人如程恩富，甚至到处批评我们承认自己非主流，是帮了新自由主义的忙。亏他想得出来。

这样的态度是否影响了刘国光，值得考虑。

5，刘国光先生的可敬人格和偏差，

刘国光文章有两重性。他是我们的老院长，老前辈，这次能以80岁高龄挺身而出，其维护社会主义的立场是正确的，

其人格是值得尊重的。他提出的领导权问题的确存在，许多新自由主义者被提拔到关键岗位，应该坚决撤他们的职。

但刘老师的文章有两个偏差，第一是立论不够准确，把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经济学简单对立，打击面过宽了。我们应该分清三个层面：

——西方经济学：主要包括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学派。

大多数研究和讲解西方经济学的教师是没有问题的，在经济政策和运行的研究方面是有很大贡献的。

他们许多人包括我们“非主流”，都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出身，而且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也有许多人食洋不化，教条主义，是应该反思的。

——国际新自由主义，是以西方经济学理论外衣包装起来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通过经济学来宣传自己基本价值观念，如个人主义，效率第一，市场万能，政府退出，全球化，华盛顿共识等。

在中国成为一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世界观，这是应该进行学术批判的。

——中国新自由主义，默认甚至利用权力，在改革中推行权力资本化，

堕落成为“瓜分派”，他们才是最危险的，大多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反对他们的。

我们非主流派一直把批判的焦点紧紧对准这一小撮权力资本的代言人，他们的典型代表是张五常等。

这是理论斗争和政治斗争，不是一般的大学教育问题。

刘国光命题从大学教育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对立起来，是有些偏差的，给我的印象是从教育界入手，直接争夺理论话语权。这就把问题复杂化了，打击面过宽，并且迫使我们不得不来论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

其实，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在于此。西方经济学虽然成为新自由主义的话语符号，但毕竟不等于新自由主义，

中国权力资本化的根源不能完全归结为新自由主义，传统权力体系也是根源之一。

在深层次的理论层面，特别历史观层面，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也有和新自由主义相通之处，有西方中心论，庸俗进化论，规律万能论，制度决定论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学马克思主义的人，后来那么容易“与时俱进”，

成为中国权力资本的代言人。

所以，反思改革，首先要批判新自由主义，同时也要从正反两个方面反思“中国老左派长期奉行的，

僵化教条的传统马克思主义。

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涉及科学和信仰的关系，主流和非主流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意义，是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提供社会主义信仰系统。

但是我们一直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这是针对空想社会主义和落后国家广泛存在的迷信而言的。现在大家对于科学的局限性有了越来越多的认识，如果是针对人文和信仰而言，科学就成为一个中性甚至略有贬义的概念。

现在一味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未必就是赞美之词。

求善与求真毕竟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功能，求善的不是科学，而是信仰，信仰是不需要证伪的，强调马克思主义主要功能是信仰而不是科学，是抬高马克思主义而不是贬低。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系统被西方新自由主义边缘化，应该坚决纠正。作为信仰系统的马克思主义要大大提升和发展，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要提高自己的水平。

真理未必就是唯一的，马克思主义外部也有其他真理，内部也有不同派别，

作为信仰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究竟应该如何塑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如何起作用，如何从信仰角度批判恶势，影响社会价值观念，影响政策，都是新课题。不可能由目前某些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专业人士所承担，

他们也不能以为自己就是信仰体系的代言人，以此树立话语霸权。

作为求真的科学系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值得研究。

第一，马克思科学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在当时社会中是非主流，在批判的意义上成为科学。

第二，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任务，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某些理念被列宁和斯大林发展，并大量使用数学工具，

在建设的意义上成为“科学”。

第三，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初期，

尚可从主流层面决定政策，推动改革，因为还有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斯大林承认价值规律可作依据。这就是为什么中国80年代经济改革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内部有生存空间的道理。

第四，90年代以后，中国在“市场经济”概念之下真正发展起资本主义经济，甚至出现了野蛮的原始资本主义，此时，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就很难从建设的意义上做“主流”了，

马克思主义是批判和反对资本主义的，其科学性可以成为批判的武器，这是“非主流”位置。

第五，当中国发生内外重大危机的特殊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可以在控制经济的意义上成为科学。

20世纪90年代，西方经济学在中国成为主流不奇怪。

因为对于市场经济特别是资本经济的具体规律和机制的研究，西方经济学非常完整，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建设性。当然，不是说它就没有问题，特别假设前提需要质疑，

比如市场经济在究竟是均衡的还是非均衡的，就一直没有定论。

假设没有国家利益，没有权力资本化，假设市场经济可以自动调节许多问题，都是在中国应用西方经济学的巨大失误。

更加严重的问题，是西方经济学的价值理念和话语系统，被某些人在中国演变成为意识形态化的新自由主义，

进一步把科学变为信仰，进一步演变成为“权力资本化，买办化”的理论依据，

进一步演变成“极右”的社会政策。我们重点要批判的，就是这四个演变，而不是一般地去指责西方经济学。大部分研究西方经济学的人是好的，

只是注意不要迷信，要注意其假设前提就是了。

刘老师的第二个偏差，是在文章里两次提起“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是某某”，这是非常不合适的。

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怎么能够由这种方式交到某一两个人手里？这就容易形成官方或者半官方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垄断。

他们将奠定一种新的理论格局：表面上批判极右，实际上真正打击的是中左，把中右吓到极右一边，重新形成以极右为主导的“中国新自由主义神圣同盟”，这样的格局能够真正解决中国权力资本化的问题吗？

搞得不好，无非是少数几个搞左派教条的人升官，拿钱，然后和极右妥协。这可能却是刘老师没有料到的。

在中国，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可能并不是那些整天把马克思主义挂在口头，除去“社会主义一大二公，坚决维护国有企业”

以外什么都不会说的人。否则，马克思为什么说他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呢？

历史上王明排挤毛泽东的教训，值得我们注意，否则，好不容易赢来的大好形势，就有可能毁在教条主义者手中，无论是左倾还是右倾，教条主义都是必定断送革命和建设前程的。

2005. 12. 28.

(来自华夏复兴论坛)

[\[第 1 页\]](#)

[\[第 2 页\]](#)

[\[第 3 页\]](#)

[\[第 4 页\]](#)

[\[关闭窗口\]](#)